

广西现代文化名人学术著述精选

罗尔纲文选  
罗尔纲文化名人学术著述精选

# 罗尔纲

## 文选

钟文典选编

广西现代文化名人学术著述精选

# 罗尔纲文选

钟文典

选编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广西现代文化名人学术著述精选

罗尔纲文选

钟文典 选编

责任编辑:宾长初 何林夏

封面设计:杨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

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125

字数:419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5633-2807-6/K·118

定价:28.00元

# 前 言

## 一、史学大师罗尔纲

罗尔纲先生是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1901年1月29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出生在一个名门望族、世代书香的家庭里。罗先生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并有机会阅读家藏的许多文史书籍,为他日后的做人和治学打下了基础<sup>①</sup>。

1925年,罗先生负笈上海,就读于浦东中学。第二年,考入上海大学。当时正值大革命前夕,罗先生满怀爱国、革命的激情,一年之间,就在报刊发表了缅怀革命先烈,歌颂战斗人生,呼吁动员群众,集中革命力量,埋葬人世间不平的诗文多篇。<sup>②</sup>1928年,转入上海中国公学。1930年毕业于中国公学中文系。随即应校长胡适之约,到他家整理其父胡传的文稿。通过认真、细致、艰苦的实践和胡适在学术上的严格指

<sup>①</sup> 罗尔纲:《生涯六记·童年记第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sup>②</sup> 见罗尔纲《困学丛书》第十种《记序文存》第一辑《沪滨剩稿》,608~61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导,养成了忍耐、小心、不苟且的治学好习惯,学到了考证的方法,并在对张嘉祥事迹的辨伪求真中走上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道路。<sup>①</sup>此后,无论是回广西从事教学或修志工作,还是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或中央研究院从事学术研究,罗先生从太平天国史而清代兵制史直至《水浒传》考辨等等,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文史兼资的著名学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罗尔纲先生主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直至1997年5月25日逝世。在70多年的治学生涯中,罗先生完成并出版了有关太平天国史、清代兵制史和《水浒传》研究的学术专著40多种,发表论文400余篇,计约700万字,参与整理、编辑并出版太平天国文献和资料3000余万字。真是著作等身!他的道德文章,深为国内外学者所敬仰,尊为一代宗师。

这部《罗尔纲文选》是我们从罗先生在太平天国史、清代兵制史和《水浒传》研究的成果中选取的。由于篇幅所限,选文重在罗先生对每个专题具有综论性或总结性的文章。选文的目录曾经呈请罗先生审阅并得到他的同意。谁知编辑的工作刚刚开始,就传来了罗先生不幸逝世的噩耗!悲痛无涯,思念长驻。谨以这部文集,作为对一代哲人的纪念了。

## 二、丰硕的学术成果

### 1. 关于太平天国史研究

罗尔纲先生是我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他研究太平天国史始于1932年秋在贵县对张嘉祥事迹的考辨。此后几十年一直以太平天国史为主要研究方向,出版和印行的有关太平天国史的著作达30余部之多,发表论文近200篇。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是最早系统介绍太平天国历史的专著,它揭示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而经过40多年的努力,几经补充、修订,1991始由中华书局出

<sup>①</sup> 《生涯六记·学徒记第二》。

版、全书 150 余万言的《太平天国史》(四卷本),则是新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总结。<sup>①</sup>

编写太平天国史,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史书的体裁问题。早在 1944 年罗先生撰写《太平天国广西人物传》的时候,他就对这个问题有所考虑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如何批判地继承封建史学体例的传统,构建人民史学的新体裁,更成了罗先生反复探索的重要课题。经过 1951 年到 1977 年的长期思考、实践和三次修订,终于建立了由叙论、纪年、表、志和传五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叙论”用综合概括的体裁概括全书。“纪年”用纲目体裁纪大事。“表”用表格体裁标明复杂繁缛的史事。“志”用专题研究体裁记典章制度。“传”用传记文学体裁记人物。增加“叙论”,概括全书,不仅克服了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的大弊,而且能够担负起理论性阐述的任务。取消“本纪”,人物概归“传”内,也就剔除了纪传体以君主纲纪天下后世的浓厚封建性。而改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组成的综合体,各有独立的任务,也就在比重上和实质上对纪传体作了根本的改变。<sup>②</sup>史书体裁上的“破旧立新”,是罗先生的一大贡献。

太平天国起义于何时,它的具体情况如何?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纪念这一场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1951 年 1 月 1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起义日期考证》一文,同时发表的有《人民日报》题为《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纪念》的社论。罗先生对起义日期的考证,是从太平天国和中外人士所记的十种不同说法中进行细致的考辨,最后认定洪仁玕在《自述》中说: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 38 岁时,拜上帝会众在金田“恭祝万寿起义”之说属实而获得的。从此,太平天国起义于 1851 年 1 月 11 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基本成为定论。在此基础上,罗先生又于 1954 年写了《金田起义考》的长篇论文,除了进一步引用幼赞王蒙时

① 《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逝世》,新华社北京 1997 年 6 月 5 日电。

② 《太平天国史·自序》。

雍《致叔上信等家书》和《天父诗》第三百四十九首的“生日开基诗”为证外，还举出《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伪官勋阶》条的注说“凡在金田与祝洪逆生日者，无论伪职大小，悉加‘功勳加一等’五字”为佐证。同时对光绪《浔州府志》、王定安《湘军记》等所持之金田起义乃“激变”而起之说作了考谬，指出金田起义乃预定计划，而非出于地方政府的“激变”。金田起义前的客土械斗“是使金田起义成为燎原之势的一件动力”等等重大事变。1979年，有的论者根据《天情道理书》说的“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遵王赖文光自述》说的“庚戌年秋，倡义金田”，以及《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说的“道光三十年十月，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等等记述，认为金田起义应在“道光三十年十月，而非十二月初十日”。为此，罗先生于1980年又写了《金田起义日期再考》的专文，指出：《天情道理书》等所说，只是指团营，而非起义。因为，金田起义的过程，可以分为各地会众奉命进行起义，进而各地实行团营，再进而到达金田团营，而后于平南迎接洪秀全回归金田，于十二月初十日“恭祝万寿，宣布起义”四个阶段。经过罗先生的反复考辨，太平天国起义于1851年1月11日，即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再次得到史学界的赞同，成为不易之论。

对于太平天国的政体问题，罗尔纲先生也有他的独到见解。早在金田起义之前，拜上帝会的领导者洪秀全、萧朝贵等就关注起义以后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了。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地秘密议论“主”和“军师”应该由谁出任的问题。<sup>①</sup> 金田起义以后，洪秀全于1851年3月23日（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在武宣东乡登极称天王，同时立军师，建立太平天国。同年12月17日（十月二十五日），洪秀全在永安州（今蒙山县）封立五王，且定西、南、北、翼四王俱受东王杨秀清节制，并将军令权交正军师东王杨秀清负责。<sup>②</sup> 至此，太平天国政权的组织形式基本奠定。对于太平天国的这种政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少论者是把它看作君

① 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② 太平天国文献《天命诏旨书》。

主专制的。到了1978年初史学界对太平天国政权开展讨论时，罗尔纲先生把有关的资料选辑在一起，于第二年写了《太平天国政体考》和《太平天国政体再考》两篇专文。1983年又发表了《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的论文。罗先生认为：太平天国的这种政制，是“以‘主’为国家元首，以‘军师’为政府首脑”。天王“临朝而不理政”，国家最高权力由军师行使，但天王对君位保持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能。“这是一种在国家组织中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制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的政体”。而“农民民主主义的比重是超过于沿袭君主制的”。这种制度，与我国自秦造清的君主制有别，亦与西方国家的内阁制不同，具有它的独特性质。考其渊源，正是远承《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的军师制而来的，他们的出现和作用可说是一模一样的。但是，1856年杨秀清“逼封万岁”，天京发生内江，杨秀清被杀以后，洪秀全声称“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把军师职权抓回手中，具有农民民主主义性质的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政体，从此就被破坏了。

太平天国革命是农民反对封建地主的战争，土地问题至关重要，也是太平天国史研究必须着重探索的问题之一。弄清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理解和评价。罗尔纲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7年前对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考察，以后又根据新发现的史料进行了多次研究和补充，其中《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重考天朝田亩制度实施问题》一文，可以说是对这个重大问题研究的总结。罗先生认为：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冬十一月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为的是“要创造一个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社会”。在此之前，已经为实行这个公有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可是，到了甲寅四年（1854年）秋，因为天京严重缺粮，于是转而采取“照旧交粮纳税”的办法。这种政策的改变，并不表明太平天国对待农民的方针和立场有所变化。因为农民只要向政府交粮，就不用再向地主交租，免除了繁重的封建地租剥削，可以过上有衣有食的生活，这也是保护农民，打击封建地主的表现。继之是向农民颁发“田凭”，着佃交粮，变千余年来地主交粮为佃农交粮。而农民“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这实质是



变封建地主所有制为农民所有制。太平天国虽然没有颁布“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而“着佃交粮”政策施行的结果，事实上收到“耕者有其田”的功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至于太平天国后期在苏浙的一些地区出现了保护地主收租、甚至镇压佃农向地主抗租的事件，不过是某些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所为，并非太平天国的政策所允许，但它却成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对一系列复杂、隐晦的史实进行钩稽、辨析，罗先生认为：太平天国政权始终是农民革命政权，说它从《天朝田亩制度》转而采取“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就是逐步走向封建化，而以一个新的封建王朝作为历史归宿的结论是不对的。

太平天国和天地会的关系，也是太平天国史上一个既重要又复杂的问题。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臆说，认为太平天国起义时，曾经一度和天地会发生联系，到了1852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天地会的天德王洪大全被清军俘获之后，太平天国即拒绝天地会分子加入了。罗尔纲先生认为，这种臆说并非历史事实。因为，太平天国起义时，不少会党分子充当乡勇，帮助清军反对革命。针对这种情况，太平天国在《颁行诏书》的《救世安民谕》中，向那些曾经歃血结盟、立志反清的天地会分子提出：应该反思自己创会的宗旨，不要帮助清军反对革命了。而且，天地会是“山堂林立，互不统属”的散漫组织，既无统一的大首领，也不可能和太平天国携手联盟，并肩作战的。但是，太平天国从起义之始，并没有拒绝天地会分子的参加。《救世安民谕》勿忘“歃血结盟，立志反清”，不应为虎作伥的劝告，也包含了争取的意思。参加的条件就是必须接受拜上帝会的革命宗旨，遵守太平天国的严格纪律。原为天地会成员的罗大纲，后来成了太平天国的著名将领，就是明显的例证。1852年太平军进兵湘、鄂以后，各地会党闻风响应，踊跃参加太平军，接受太平天国的收编和领导，壮大了革命实力。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刘丽川领导小刀会在上海起义。太平天国不但派人与他联络，致书望其“率众来归”；而且驻守镇江的罗大纲曾经积极制造船艇，谋与刘丽川互相联合、声援。可惜太平军当时正在北伐、西征的两个战场作战，无法抽调兵力支援上海。

1855年小刀会起义失败，它的领导者之一潘起亮冒险加入太平军，专司天朝关税，受到太平天国的“荣封”。以上种种，也说明太平天国并没有拒绝会党加入的事。值得注意的是，1855年石达开在江西接受广东几支天地会队伍的加入，而没有按照既定的原则对他们进行改编、教育和改造，使他们仍旧保留原来的旗帜、组织以及称号，结果出现了破坏纪律，不听指挥，以致在紧要关头叛变投敌等等事件。罗先生认为，这是太平天国和天地会联合所犯的一个大错误，其教训也是至为深刻的。

在论及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时，罗尔纲先生指出：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经侵入中国，成为中华民族的危險敌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太平天国除了担负起反对封建势力的任务外，又肩负了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任务。罗先生不同意太平天国致败的最大原因在于不懂外交，或说因为崇奉的宗教形式与外国侵略者相同而误把敌人认为兄弟的观点。罗先生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不在对外而在对内。因为，太平天国的对外方针是反对侵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方策是利用宗教，准许通商和友好往来三项。既不与外国失和，又对侵略者存有戒心。由于面向内外两大敌人，所以太平天国的决策是首先打倒封建王朝，然后再驱逐外国侵略者。通过对太平天国起义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一系列大事，特别是粉碎英国侵略者提出帮助攻打清朝而平分中国的阴谋，并在外国侵略者拔刀相向时为了保卫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开展的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都说明太平天国的方针是正确的。

在论及太平天国的反孔历史时，罗尔纲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讨孔运动。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太平天国独尊皇上帝和孔子宣扬无神论的矛盾，既然要树立“上帝之子”的权威，就必须反孔。二是洪秀全提出“变”和“新”的天道观，和孔子天道不变的天道观的矛盾。为了动员群众，开展革命，洪秀全从革命酝酿阶段，直至金田起义进军过程中，就从理论和行动上对孔学和孔庙进行了猛烈的冲击。这种斗争，明显地把推翻封建统治同摧毁作为封建统治精神支柱的儒学紧密结合，而且贯穿太平天国革命的始终，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代

表了时代的要求。与此同时，罗先生也指出，为了反对孔子学说而毁书焚书，这种毁灭古代文化的举动是粗暴的、不对的。虽然如此，就历史意义而论，太平天国的反孔极大地震撼了封建统治，对摧毁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所建立的历史功绩却是伟大的。

对太平天国在文体上的改革，罗尔纲先生也做了精辟的论述，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文体的改革是洪秀全、洪仁玕等人通过革命的实践，明确、深切地认识到人民的需要而提出来的，是太平天国反对封建统治在文化思想方面的表现。革命要求具有思想性、战斗性的人民纪实文学为之服务。早在金田起义时期，洪秀全即身体力行，在发布文告中实行文体的改革。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与“天朝田亩制度”颁布的同时，也发布了反对封建古文，提倡语体文的命令。1861年（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清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发布的《戒浮文巧言谕》，对文体改革的形式、内容都提出了极为明确的指示，反对“古典之言”，严禁“浮文”、“巧语”，提倡“文以纪实”，“言贵从心”，“使人一目了然”。于是，删订新字典，制定标点符号，删改《诗经》，“尽去其中的鬼话、怪话、妖话、邪话，只留真话、正话”。这些改革，虽然不够深入彻底，缺点甚多，尚处于粗朴阶段，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居近代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导地位。罗先生还指出：研究太平天国诗文，必须根据农民革命利用宗教作为发动群众的工具。乍看起来，似为荒诞不经。但是，如果揭去它的宗教外衣，即可见其反封建、反侵略的伟大内容，体会到太平天国诗文的真正价值。封建地主阶级嘲讽太平天国文书中的所谓“俚语俗词”，说它是“故意矫揉造作”，正是洪秀全、洪仁玕等人不辞艰苦，不懈努力，建立太平天国新文体的体现与成果。

罗尔纲先生对太平天国历法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从那时起，先后发表了讨论“天历”的论文多篇。《论天历》一文，则是对这一历法进行全面的论述。罗先生指出：太平天国的“天历”，是一种以节气定时的太阳历。它是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发明的节气为造历原理的四季历法。它整齐划一，使用方便，在天文与气象上皆具价值。太平天国的“天历”革创于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冯云山被囚禁在

桂平监狱之时。1852年2月3日(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正月初一日,清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四日)首先在永安州颁行,至1869年5月28日(太平天国己巳十九年四月十一日,清同治八年四月十七日)太平军余部在陕西保安县老岩窑兵败,计在长江流域及太平军西征、北伐所到之地行使了19年又4个月。细考“天历”,其特点有五:一是以四季成岁;二是以立春为岁首;三是单月31日,双月30日,每月一节一气,划分整齐;四是扫除了旧历书中的封建迷信思想;五是向农民传播科学常识,为农业生产服务。在论述了“天历”的积极意义以后,罗先生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方面。这就是:“天历”岁实比旧历年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虽然采取了40年一加或40年一“斡旋”的办法,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由于对“亏缺”的迷信忌讳,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拒绝使用闰法以补奇零的日数。因此,也造成了“天历”无法达到与四时气候相适应,使它成为计算精密、使用方便的历法。太平天国的领导者虽然宣称“百无禁忌”,而在“天历”的创造上却给另一种迷信束缚了自己,构成“天历”走向科学的重大障碍。太平天国历法表现的这种局限,也生动地反映了农民革命的局限性。

自从在江浙等地发现了太平天国的壁画以后,引起了罗尔纲先生的极大兴趣。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罗先生考究有关太平天国壁画的文章就有近20篇之多。《论太平天国的壁画》一文,系统考察了从周代以来我国壁画发展的历史,说明太平天国壁画的历史渊源,以见太平天国提倡壁画并非凭空而来,也不是主观盲目的;它既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因为饱受封建压迫的农民,没有条件去欣赏那些悬挂于巨宅广居,珍藏在锦包木匣,使用绫裱绢装的卷轴画,却有机缘饱览那些绘制于祠庙,富有五光十色的壁画。这也是太平天国所以摒弃卷轴画,提倡壁画的缘由。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选集军中及地方的画工、画士,建立绣锦衙,专主采绘事。天京一地,劫掠之余,尚存当年壁画千余处。而江苏、浙江、安徽许多地区,也多有太平天国壁画的遗存。根据罗先生的考证,太平天国的壁画除了不准描绘人物外,其发展山水花鸟画的艺术,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

方法,绘制富于战斗性的飞禽走兽,以及设色极工,形成了太平天国壁画的四大特色,是以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具有重要的价值,无疑是值得我们十分珍贵的人民艺术遗产。

太平天国人物也是罗尔纲先生研究的重点。在《太平天国史》中为之立传的各式人物即达170余人。其中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翼王石达开、干王洪仁玕,尤其是忠王李秀成,都是罗先生研究的重点人物。据不完全统计,仅李秀成传记及对其“自述”的笺证、考据,就有四种之多,研究李秀成的论文也在10篇以上。他的《李秀成传》和《李秀成伪降考》,罗先生自言是“生平的苦作”中的两种<sup>①</sup>。早在1944年,罗先生根据李秀成一生“铁胆忠心”的历史,和他劝曾国藩反清做皇帝的传说,初步提出了李秀成学蜀汉姜维伪降钟会故智以图恢复太平天国的看法。1954年,罗先生写《忠王李秀成传》,论及李秀成的伪降,也认为难免有亏革命气节,不足为训之处。1964年,罗先生写《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1977年得到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绩教授提供的“李秀成劝曾文正公当皇帝,文正公不敢”的口碑,于是再写《李秀成伪降考》。罗先生首先从李秀成的“自述”入手,仔细查考,发现疑案12项,说明李秀成在“自述”中的许多表白,都是虚伪的,是“有所为而言的”。再从李秀成在“自述”中的称人、叙事考察,一面表现了革命者的坚定立场和情感,同时对“让城别走”的大计,幼天王的脱逃,湖州、广德各地友军的动向,以及一再声称国库无存银等大事的隐瞒、虚报,讳莫如深,也说明李秀成在“自述”中提出的“收齐章程”等等,确是“实有所困”,而非真心降敌。罗先生进一步通过有关的历史事件和事实,如封建统治者的“剿抚兼施”与农民起义军利用伪降以图重振旗鼓;当时的敌我形势以及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李秀成通晓“三国演义”故事,练就“外柔内刚”的性格和专以智取的谋略等等,都足以检验李秀成伪降实乃自然之事。李秀成伪降之计虽然没有成功,但也起到了掩护幼天王出走,掩护湖州、广

<sup>①</sup> 1989年10月13日罗先生以新著《困学丛书》赐我时写道:“《李秀成传》、《李秀成伪降考》、《八法对笔迹的鉴定》、《太平天国的游击性运动战》和《治学篇》,均是生平的苦作。”

德太平军向江西转移的效果。他的就义,也是“欢乐归阴”的。

一部太平天国史,内容十分丰富。这里选取的11个问题,皆其萃萃大者。罗尔纲先生积数十年功夫,对这些问题详加考究,辨难释疑,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 2. 关于清代兵制史研究

罗尔纲先生对清代兵制的研究,起始于1936年,至今已有60多年。除清代的八旗兵制当年已有学者研究外,举凡绿营、湘军、淮军、新建陆军、海军、练兵和兵工生产等,皆有专门研究,并且分别出版了《绿营兵志》、《湘军新志》<sup>①</sup>和《晚清兵志》三部专著,其中《晚清兵志》含《淮军志》、《海军志》、《甲戌练兵志》、《陆军志》、《军事教育志》和《兵工厂志》六卷。<sup>②</sup>

兵制研究属于制度历史。罗尔纲先生认为:“研究制度应当尽力去搜求材料,把制度重行建造起来。此与考古学家从一颗牙齿构造起一个原人一样,这可称为‘再造’工作。研究制度的目的,是要知道那个制度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平时如何组成,用时如何行使,其上承袭什么,其中含有何种新的成分,其后发生什么。如此才是制度史。”因此“凡与制度无关的一概不述,非唯力求简明,亦才符合制度史的要求”。<sup>③</sup>

为了解罗尔纲先生对清代军事制度的研究,我们首先选了他的《清代兵志题记》。在这篇只有2000余字的短文里,我们看到了罗先生60年研究清代兵制的来龙去脉,全部过程;看到了他的研究主旨和使用方法的异同。具体说来,研究湘军和绿营,目的在于探索两种不同的兵制如何造成两种不同的政局。就研究方法说,是对一个假设进行正反两面的求证。论其性质,无异于两篇考证。而对晚清兵制的研究,则是把从淮军起到清末建置陆军36镇止,这49年时间兵制的变迁发展,

① 《湘军新志》和《绿营兵志》,分别于1938年、194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年,《湘军新志》经过改写,改名《湘军兵志》,与《绿营兵志》(改写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② 1997年,《晚清兵志》前四卷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后两卷正在排印中。

③ 引文见《晚清兵志》第一卷《淮军志·前言》,中华书局,1997。

根据看到的史料,先探索出一条线索,然后再把它编排出来。这种编排史事的目的是使读者看清历史的过程。论及绿营和湘军这两种不同的兵制,罗先生认为前者是“兵为国有”,而后者是“兵为将有”。所以近代军阀的出现,其根源即在湘军这种兵制。罗先生的《清代兵志题记》一文,提出了他研究和编写“清代兵志”的纲领性构想,也是我们学习和理解他的研究成果的一把钥匙。

《〈晚清兵志〉叙例和导言》,则是罗先生关于研究晚清兵制的主旨和全书主要内容的说明。记载“清代兵志”的著作,属典章制度专史的一种。历史上有通典、通考或盐法志一类著作,其优点是辑录史料丰富,其通病则是内容记载琐屑,有如一部流水账。罗先生研究并编写《晚清兵志》,批判地继承传统,“略师旧著之长而补其缺陷”。一则保存晚清兵制的章制,肩负起通典、通考一类著作的任务;一则述其制度的运用和演变的轨迹,以补旧日通典、通考一类著作体例的缺陷,以便对1862年(同治元年)淮军在安庆成立时起,至1911年(宣统三年)清帝国被推翻时止,前后49年晚清兵制的全部演变发展过程,得到一个系统、明确的了解。至于我国近代的陆军兵制,罗先生认为开端于1852年湘军的兴起,而成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练兵处颁布陆军制度。他把这52年中国陆军的演变,划分为湘军时期(1852—1864),淮军时期(1862—1894),甲癸练兵时期(1894—1903)和陆军成立时期(1903—1911)。中国海军则肇始于同治年间(1862—1874),而成立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制度的奏定。其前无遗规可承,规制全仿西洋。由于清政府腐败,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惨痛结局。至于军事教育和兵工厂两个方面,则是做了筚路蓝缕的工作。而在光绪末年练兵处和陆军部颁布的陆军学堂各项章制,按之国情,亦颇富法意。罗先生对晚清兵制的这些基本观点,对我们研究晚清军事制度是颇有帮助的。

具体到绿营兵制的研究,我们选了《绿营兵志》一书的前两章。一个是探索清初建立绿营兵制的原因。根据罗先生的考察,绿营是清代咸丰朝以前最主要的正规军。它是清朝入关以后建立的。创建绿营兵制的原因有三:一是因为八旗兵员有限,入关以后要镇压全国各地纷起

的义军,达到开疆拓土的目的,急需增添兵员,以补八旗兵力之不足。二是八旗所长在骑射,适于平原作战。入关以后,采取以汉制汉的政策统治中国,就必须有强大的、适于山地与水上作战的军队。三是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初,到处受到起义军的攻袭,不但疲于奔命,而且对已经占有的地区也无法进行统治,于是必须以有定的守兵,制无定的变乱。因此,非建立绿营兵制就不能巩固和发展清王朝的统治。统一既成,绿营兵除负责镇守名城要地之外,还兼负西北用兵、东南海防和边防、屯戍、河工、漕运、守陵以及“察奸”、缉捕、缉私、解送等等差役,实际包括了军队、警察、差役、河夫等等庞杂的性质。罗先生还把绿营和八旗作了比较,指出:八旗“集中驻屯,务求其合”;而绿营“分散驻屯,务求其分”。八旗武器装备优良,而绿营武器装备一般。八旗独当京师警卫,而绿营不得参与。八旗不负差役,而绿营兼充百役。八旗如有罪犯,可以出旗为民,而绿营兵丁则被视如隶卒。八旗饷项优厚,而绿营则饷项微薄。清朝统治者出于民族畛域,虽然极力提高八旗地位以压抑绿营,但因绿营在兵数及战斗力方面常胜于八旗,所以在清朝统治工具中却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

论及绿营兵制的源流,罗尔纲先生指出:它脱胎于明代的镇戍制度而又有所发展和改变。罗先生以明代蓟州镇营制与清初天津镇营制进行比照,观察他们的承袭渊源。又以清初绿营与明末镇戍的镇数及其驻地相比照,看出绿营对明代镇戍制的发展与演变。这样就使我们对绿营制创建的渊源、组织、发展和变化,得到一个全面的认识。

关于湘军,我们选取了罗尔纲先生的《论湘军》和《中国近代兵为将有的起源》两文。前一篇文章原为《湘军兵志》一书的“绪言”,收入《太平天国史丛考乙集》时曾略为修改。罗先生指出,湘军是在八旗早已腐朽,绿营又受到太平军的致命扫荡之下,由曾国藩、胡林翼等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它从招兵、选将到筹饷皆与绿营相反,并逐步替代绿营而使清朝兵制发生根本的变化,军队与国家的关系亦随之改变,表现为过去的兵权握于兵部的世兵制被湘军的“兵随将转、兵为将有”所代替,湘军的将帅亦因此而兵政大权在握,多为地方督抚,形成



督抚专权,中央失控,开启了近代中国分崩割据的局面。1864年(同治三年)湘军解散以后,被骗的农民愤然醒悟,转而组成反清的哥老会势力,与督抚专权从不同的方面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中国近代兵为将有的起源》一文,认为它起源于咸丰初年曾国藩创建的湘军,而其关键则在湘军的组织制度,即“弃世业的行伍,而用自招的山农以为兵;舍补选的将弁;而延乡党亲信的儒生以为将”。而湘军“就地筹饷”的方法,也是助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清廷“中央既没有强固的兵权,财权又落入将帅之手;而为将帅者复多膺任疆寄与民事,于是造成这个‘兵为将有’、外重内轻以致分崩割据的局面”。

在《晚清兵志》中,罗尔纲先生对准军、海军、甲寅练兵、陆军、军事教育和兵工厂各志,也本着理清源流,明其所以,讲明目的诸原则,进行了全面、具体的论述。

罗尔纲先生在清代军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重视。美国学者拉尔夫·尔·鲍威尔称他是“中国军事历史家”,认为他的关于清代军事的著作,“对充分了解晚清军事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本质极其重要”<sup>①</sup>。这个评论应该说是十分恰切的。

### 3. 关于《水浒传》研究

《水浒传》是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之一,流传甚广,影响极大。罗尔纲先生经过60余年的潜心思考、探索,写出了《水浒传原本》与《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两部专著及论文多篇。这里选取的《水浒真义考》、《〈水浒传〉的著者及其成书年代》和《〈水浒传〉与天地会》三篇论文,主要是解决《水浒传》的著者、成书年代、主题思想及其与天地会的关系等几个重大的问题。

研究《水浒传》,首先遇到并且需要解决的是它的著者和成书年代问题。从明代嘉靖至今400余年,对此歧说颇多,有说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的,也有只署施耐庵或罗贯中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罗尔

<sup>①</sup> 转引自郭毅生同志为《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一书所写的“代前言”(道德文章第一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